

# “一国两制”与香港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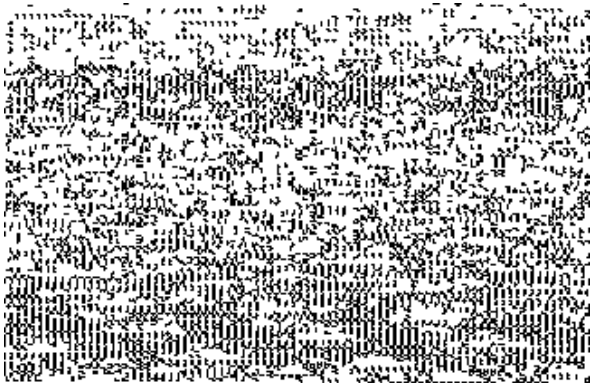
本刊特约记者 邓聿文

1997年,在中国的编年史上,由于香港的回归,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不仅昭示着一个古老民族百余年耻辱的结束,开辟了香港的新纪元,而且向世界宣告:一个伟大的构想,在经受了15年过渡期风风雨雨的考验后,从此将要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

## 从信心指数看“一国两制”

无论采用武力的或是和平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目标和任务都是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香港现行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功能不变并在回归后继续向前发展。然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各国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武力的方式显然达不到这一目标,只有“一国两制”才是各方都能接受并保持香港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佳途径。“一国两制”是基于现实国情和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构想,正如南斯拉夫《政治报》1994年10月2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邓小平“首先绝无仅有地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以前,谁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英国前首相亲自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的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制”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创造。总之,凡是世界上不抱偏见和敌意的政治家,都把“一国两制”看作是邓小平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理解“一国两制”的深远意义。由于长期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海外和香港的一些舆论,总是武断地推论“一国两制”难以实现,直观地把“九七”视为



大限,香港将会死亡。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世界怀疑香港能否与中国融为一体,并保持自由运作的资本主义方式。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前,他们就曾预言,如果“九七”后香港不由英国人管理而由中国人管理,香港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其经济也将出现剧烈动荡的局面,“东方之珠”可能从此暗淡下去。特别是随着“九七”的到来,这种怀疑和预言孕育了一系列有关“九七”的书籍和评论,大多取名“香港的命运”、“香港的衰落”这类耸人听闻的标题。在这方面,美国的《财富》杂志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周刊充当了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样板。《财富》杂志在1995年推出了一期封面故事,就取题为“香港的死亡”。正是在此种论调的刻意渲染下,香港的确一度人心浮动,社会不安,楼市和股市大幅下调,人员和公司纷纷外迁,这在90年代初尤甚。

有人在今天对“一国两制”持有观望和疑虑的态度,是正常和不足为奇的。因为作为一种新事物、新构想,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还有个深化的过程。尽管如此,事实却给了他们最好的回答。当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公诸于世,并在此指导下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特别是1990年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基本法》后,香港市场迅速稳定下来,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的态势。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中英因政

制之争关系一直不好,但即便如此,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实力仍在不断增强。现在,香港已完成过渡,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过渡后的香港经济和社会会出现“剧烈震荡”与“灾难”;相反,人心思稳、人心思归,迎“九七”、庆回归化成了一股坚实的力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和发展。西方传媒关于香港阴暗的预言像泡沫一样在“九七”明媚的阳光下破灭。

“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同时,它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为未来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预期,或者说,提供了香港社会及国际投资者对香港未来的信心指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一些民意调查中表现出来。在香港回归前夕,有关机构曾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多的被访者表示对未来香港的繁荣具有信心,这是此类调查的信心指数在1996年大幅攀升后的进一步攀升。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说:“我个人以及我的家人、我的公司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李嘉诚的话可谓代表了广大香港同胞的心声。事实表明,所谓香港“九七”信心问题,并不是过去港英及一部人所歪曲和渲染的“负面影响”,而是全面的、积极的正面影响。港人及国际投资者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就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施的信心。从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的成立到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正逐步落实,深入人心。在这个大趋势、大背景下,香港同胞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经济的前景普遍看好,对未来香港的信心更加增强,一些过去持观望态度的海内外投资者已开始或准备在“九七”前后进入香港市场,争取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分享由“九七”回归这个历史性机遇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可以肯定,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不仅具备过渡前已形成的投资环境,还将具备更优越、更有利的盈利条件。香港仍是全世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区之一,企业发展机会较

多,市场比较规范,法律比较健全,投资比较安全。因此,不论是香港资本还是外来资本,要实现增值的目的,香港确是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据香港英国商会的调查显示,99%的受访公司表示未来会继续在香港发展,1996年不仅没有英资公司撤走,反而有约20家英国公司来港设立了分支机构。香港向海外移居的人数也在下降,而回流人数却大幅增加。最新统计表明,香港移民回流比例已超过了60%。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及其实施,是香港同胞及国际社会对香港未来信心的不断增强,为香港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

### “一国两制”对过渡时期 香港经济的作用

百年岁月,流逝无声。同样是实行自由港政策,同样在这个天然良港,同样是地处欧、亚、美、澳四大洲交通要冲,但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给香港带来繁荣,相反,米字旗下的香江留下的是数不清的苦难和屈辱。

直到本世纪50年代,香港仍然仅能依靠转口贸易维持生存,生产总值才30多亿港元,以当时的经济实力论,不仅远落后于上海,还落后于广州。

翻开香港经济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香港真正走向繁荣,还是近20多年的事。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处于转口贸易期;

从50年代到70年代,开始进入加工制造业期;

从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亚太地区乃至国际金融中心。

以上我们对香港经济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是想说明这样一个朴素的事实:过渡时期香港经济的成功,离不开“一国两制”的作用。

以“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为主的中国因素是过渡时期香港形成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

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80年代更提出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前途问题，这些方针政策及中国内地实行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趋广泛和深入，对香港经济繁荣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贸易方面，据统计，1978~1996年香港和内地的贸易额由108亿港元增加到10498亿港元，增长了近100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9.3%上升为近40%。香港转口货物中来自或转往内地的约占90%。香港生活必需品和进口商品中来自内地的分别约占40%和30%。目前，内地已成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转口市场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两地贸易的急速增长，带动了香港金融、保险、航运、仓储及各类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内地尤其是华南地区为香港厂商提供廉价劳力和土地资源，香港与内地实际上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极大地提高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香港制造业已有八成以上移到内地，雇用了约500万内地劳工，这个数字是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的15.3倍，是香港的劳动人口的1.6倍。截止到1996年底，香港对内地的投资累计已超过900亿美元，占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的63%。港商在内地投资办的独资或合资企业已达14万家，占内地全部外资企业的2/3以上。这种趋势进一步促进了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使香港发展为华南地区的服务中心，服务业进一步蓬勃发展。进入90年代，香港大财团和大企业积极投资内地基础设施、房地产及第三产业。与此同时，内地资金亦加快投资香港的步伐，在港中资力量日益壮大，资产已超过400亿港元，成为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香港同内地这种紧密的经贸关系，已经并正在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香港经济在前几年西方经济一片不景气的情况下，不仅保持稳定，而且持续地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由此可见，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服务中心，其依托的是内地广阔的腹地，其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内地的投资市场和经济活动。香港之所以能够在尚未实现制造

业产业升级，形成高增值工业的情况下，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站在同一行列，其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靠了内地经济强有力的支撑。如果站在国际市场的角度看，香港市场基本上是内地经济一个敏感的反应区，其整体市场已经具有浓厚的“中国概念”。

香港经济在过渡时期取得的成功，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同时，它更是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构想逐步实施密切相关的。有了内地的改革开放，才有祖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香港经济的积极推动和支持，才有香港制造业资本大幅度的增值和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也才有海外资本在香港的聚集，以借道香港投资内地。有了“一国两制”，才有贯穿于国际因素、内地因素和香港内部因素的积极的信心因素，才有来自海内外的积极投资，也才有香港经济的平稳过渡和繁荣稳定。

## 未来的考验

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我国已对香港恢复行使了主权，五星红旗在香港这片历经了150多年殖民统治的土地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又将香港带入一个新纪元。香港的未来如何？令人注目，而人们关注香港未来前途的焦点又集中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由此可见，“一国两制”联系着香港的昨天、今天、明天……。

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港人和国际社会对未来香港的信心，首先取决于它的经济发展，而回归后，香港若要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并非没有困难。且不说香港内部经济的空心化、中介地位相对下降、贫富分化与失业等问题困扰其发展，香港现在正遭受到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强有力的竞争与挑战。就说东亚“三小龙”吧，新加坡要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智慧岛，又决心跳出地域限制，把整个亚太地区作为未来“新加坡无限公司”的发展空间。韩国立志也不小，为了同日本一较高低，他们已把中国内地以至俄罗斯都视为拓

展的“腹地”。台湾虽受到两岸关系不明朗的痛苦困扰,也仍然喊出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口号。亚太地区的这些“邻居”都想利用香港“九七”变革的机会取而代之,所以我们说,香港应当要有危机意识,即便撇开“九七”因素不谈,香港本来也应该为自己在21世纪寻找一个恰当的地位。

那么,香港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关于香港未来的定位,取决于它是否能保持东西方兼收并蓄、融合激荡的开放环境,取决于我国政府如何把“一国两制”的抽象原则变为今后香港的现实,这应该说是在香港新纪元、新形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考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香港的利益早就开始同祖国内地融合在一起了,“九七”之后香港的发展前途更离不开中国的大事业、大背景。

为了确保“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影响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

#### (1)“变”与“不变”的关系

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同胞也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和治港的主体,这是香港政权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香港回归后保持“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这“三不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50年不变。

“一变三不变”是我国对香港的基本原则。变的是政权性质,殖民主义的政府体制要彻底改变(例如将英人治港改为港人治港,将总督制改为行政长官负责制等),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消除殖民主义的种种色彩和痕迹。不变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法律(基本不变),是已经载入中英联合声明并在基本法中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的“一国两制”方针及一系列政策,这是保持香港经济活力和原有优势,保持继续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是不应该变的。根据这“三不变”,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私有财产仍受保护;香港居民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保护;香港的法律,除那些同基本法相抵触的必须删除或修改,以及因实际情况变化而不再适

用外,均保持不变。

#### (2)两制关系

两制关系指的是在一国之内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主体的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在两制关系中,我们首先要强调“存异”。因为只有“存异”,才能消除疑虑、安定人心、稳定政局、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回归之后,讲“存异”,就不仅要长期坚持两制并存,而且还要强调如何充分发挥相异制度各自的优势,发掘各自的潜力,以尽力调动“异制”的积极因素,彼此互补共济。应该承认,差异就是矛盾,异制并存总是存在矛盾的。如果处理得好,矛盾可以成为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冲突乃至对抗。

其次,我们要“求同”。因为两制在一国内和谐并行,是需要有共同的良好政治经济环境与条件的。我们讲“求同”,是在异制之中或之外求同,寻求与发展共同的利益与需要,抑制异制中相互排斥的消极因素,使两制在运转中逐渐磨合,各按步调,共同前进。同时,讲“求同”,并不是将异制同化,由多元变为一元,由两个“主义”变成一个“主义”,而是承认内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香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可以“殊途而同归”的。这两个“主义”当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主体与枝干,主流与分支的关系;且前者包容了后者,二者道路不同,但方向一致,目标一致,都是要把整个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但是,在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求制度趋同,而是要明确共同的目标与任务:一是共同为保持和发展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局面创造条件,二是共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各尽所能。这就要求内地与香港都共同保持安定的政治局势与融洽的社会环境,不要出现动乱;要求更加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以适应两制和谐相处,经济往来中互助互济,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要求发展民主,完善法制,使两地同处于健全的法治状态,以使两制之协调有法可依,两制之关系能依法保障。

### (3) 内地与特区的关系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回归成立特别行政区,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只负责管理特区的防务和与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以及任命特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而不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中央人民政府也不派人到香港参与特区政府的管理,而由以港人组成的特区政府自行管理。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是为了体现国家的主权和执行防务,它隶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不干预特区的防务,只在必要时经特区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可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费用也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驻军人员不仅要遵守全国性的法律,还要遵守特区的法律。由此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仅有别于内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而且有别于内地的经济特区,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分别对待,以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承诺。

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遵照基本法的规定,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与特区有分歧,要按“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有关规定,通过沟通、协商解决。如需在香港设立机构,要征得特区政府同意并报中央批准。内地人士如要进入香港,要按香港入境管理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从香港方面来说,一切都要以基本法为依据,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都要与基本法相衔接。当然,还要结合香港的特点,考虑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解决好涉及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总之,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这是重大的历史转折,要适应这个转折,港人有个“心理过渡”的过程。我们要继续增强港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做好争取民心的工作,必须在对香港的政策措施上、工作方法上、舆论宣传上,都强调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切不可生搬硬套内地的规制,按内地的要求和程序办事。

### (4)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香港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城市,而是一个自由港,它的优势在于经济。香港人最关心

的是回归后生意能否照做,经济能否保持繁荣稳定,生活能否继续得到改善。因此,香港回归之后,要避免香港卷入各种政治争论和国际纠纷之中,警惕一些人打“国际牌”,企图把香港变为西方向中国施压的工具。

承认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的事实和保持香港的经济城市地位,是真正对香港和港人利益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反对把香港变成政治城市,指的是不能使香港成为国际政治势力角逐的场所和对抗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否则,香港本身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当然,以经济为中心,并非意味着政治问题不重要,可以不重视。在政治与社会方面,香港目前存在着各种矛盾,诸如劳资纠纷,经济犯罪,治安问题,福利问题,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的分歧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倘若处理不当,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繁荣稳定,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又值回归这个历史性大转变时期,一些国际势力还会利用香港来实施其遏制、演变中国的图谋。他们尤其了解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同港内所谓民主派人士相配合,制造混乱。如美国驻港总领事就曾扬言,若香港没有高度自治,美国就会把香港看作中国的“一个一般的部分”,把对中国的各种歧视和不合理政策加诸香港,如取消配额,限制高技术产品,实行关税、贸易制裁等。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当今香港的“政治”。此外,香港和海外人士普遍关心的法治、廉政、新闻自由、公平竞争等问题,也要认真对待,切实保护。总之,以经济为中心,就是要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处理好,使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兼顾,共同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正如香港特区长官董建华在《追求卓越共享繁荣》的回归庆典演辞中所说:“香港回归祖国,是香港发展的一个契机,要使得“一国两制”的事业成功实现,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国家,发展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建立我们的价值观;维护法治制度;保障自由的空间;推动民主进步;和确立长远的奋斗目标。”我们相信,香港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下,定将创造新的奇迹,新的辉煌,为中国、为亚洲、为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